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唐仕春 编

师复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 国 近 代
思 想 家 文 库



唐仕春
编

师 复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师复卷/唐仕春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

ISBN 978-7-300-20462-8

I. ①中… II. ①唐…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师复 (1884 ~ 1915) -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2892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师复卷
唐仕春 编
Shifu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010 - 62511770 (质管部)	
电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	13.25 插页 2	印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08 000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 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 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言

1915年，师复因病逝世，年仅31岁。他短暂的一生，仅仅用生命最后阶段不足十年的时间，却做了许多人穷一生之力都不一定能做的事情。师复是同盟会最早成员之一，暗杀活动的组织者与实践者，“心社”的发起人，世界语的传播者，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偶像”式人物。变革、动荡的时代成就了师复短暂人生的波澜起伏，师复身上亦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复杂、激越。

一、波澜起伏的短暂人生

师复，原名绍彬，字子麟，学名绍元。1904年赴日留学时更名为思复，1912年7月与莫纪彭等创立“心社”，制定了属于“个人进德”性质的十二条社约，其中有“不称族姓”一条。从此之后，刘思复不再称自己的姓氏，改名“师复”。^①

1884年6月27日，师复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石岐镇。刘家是当地的望族，家境殷实，院内有池塘、桥廊、亭榭等建筑，被称为“水楼刘家”。师复之父刘鼎垣，字炳常，是个读书人，维新运动时，创办了香山县第一所学校。曾组织“天足会”，每年都要印赠维新派人士宣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筑路的小册子，被人看作该县第一个新派人物。师复幼时很聪明且能做文章。1899年，师复应童子试。但他却很看不起举业，独自研究小学及诸子，笔记极多；对于中国古代数学颇有研究。

^① 师复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使用过多个名字，在其人生最后阶段，自己最为认可的名字是师复，近代思想史中最为人知的名字也是师复。当时有人与他通信，在其名字之前冠以姓氏，师复马上去信纠正。为了表述方便，本书统一以师复称之。

1901年，师复参加乡试，但落第。这时，他开始研读谭嗣同的《仁学》，并与同乡友人郑彼岸在石岐镇创立了演说社。由宣传新思想而逐渐走向反满革命。

1904年，师复与郑彼岸、林君复等经香港赴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与俄、日虚无党人接触，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制造炸弹的技术。日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主编的《直言报》及其《帝国主义》、《基督抹杀论》、《广长舌》等著作，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1905年，师复加入同盟会。同年年底，由日返粤，参加香港《东方报》的编辑工作。

1906年，在故乡石岐镇创办“隽德女学”，提倡女子教育，并设立“武峰阅报社”，用以销售革命报刊及掩护革命活动。

1907年初，革命党人准备在潮惠地区发动武装斗争，因师复曾在日本学习过制造炸弹的技术，故安排他到广州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6月，师复制造炸弹时不慎失事，身受重伤，在治疗过程中被割去了左手，并遭到警吏的拘捕。审讯过程中，师复为掩盖真相伪造供词，被李准的幕僚郑荣识破，送回原籍监禁。1909年冬，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逢宣统大赦。经香山各界人士联名禀保，师复于12月10日获释出狱。入狱两年多，经种种刺激及研究，师复思想一变，出狱不久即赴香港，致力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纪》，宣扬无政府主义。

1910年2月中旬，师复在香港与朱述堂、谢英伯、陈自觉、高剑父、程克等人聚议组织暗杀团，定名“支那暗杀团”。最早成员为师复、朱述堂、谢英伯、陈自觉、高剑父、程克，后来陈炯明、李熙斌、梁倚神、丁湘田（师复之女友）、林冠慈（初名林冠戎）、郑彼岸相继加入，团员共计12人，未正式加入而参加暗杀团之活动的，亦有十多人。“支那暗杀团”的章程为师复所起草，以“反抗强权”为宗旨，取单纯破坏之手段。从此之后，师复虽未尝标揭无政府之主张，然已经转变为反抗强权的革命党，而非政治的革命党。且此后皆独立活动，与同盟会亦几无关系。

1911年，师复参与林冠慈炸伤李准事件和李沛基炸死广州将军凤山事件。林冠慈是暗杀团成员，李沛基炸死凤山的炸弹由师复制造。1911年武昌起义后，师复在广东参与策动民军的活动。他曾与同志数人北上谋刺摄政王载沣，本在四川湖北革命军未起之前。因暗杀团的一位成员先行，并运输炸弹，不料中途败事，师复等计划更动，故推迟到

革命军兴，始得成行。此时强权之魁首已转为袁世凯，故师复等人的刺杀对象改为袁世凯。师复与暗杀团的成员到达上海时，南北议和刚刚开始，有人劝师复等勿急行。不久议和成功，清朝政府崩溃，革命形势的逆转给师复以很大的刺激，他于1912年春解散了暗杀团。

师复等以为，“可以乘此机会散布社会革命之种子，而单纯破坏转非所亟”。1912年2月，他和莫纪彭、林直勉、郑彼岸等在杭州白云庵集会，酝酿拟定了“个人进德”的一系列条约。心社的社约，就在此时创议。

1912年4月，师复返回广东。该年夏天，师复在广州西关宝源路平民公学设世界语夜校，由法国留学归来的许论博传授世界语，借世界语宣传无政府主义。师复认为，“世界大同当以言语统一为先导”。同年秋天，他们在广州东园建立“广州世界语学会”，国际世界语协会委派许论博、师复为驻广州的正、副代理人。短期内发展会员300多人。师复创办的《晦鸣录》及《民声》周刊为国内最早的世界语刊，蜚声国际，其中《世界语第九次万国大会记事》一文为国内对国际世界语大会最早的报道。世界语为师复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推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师复使世界语在国内的传播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5月，师复在广州西关存善东街八号发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舍”。晦鸣学舍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定位于“平民之机关”。其纲领包括“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晦鸣学舍侧重于对外活动，主要任务是传播无政府主义。

7月，师复与彼岸、纪彭等创立“心社”，制定了属于“个人进德”性质的十二条社约，包括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乘轿及人力车；不用仆役；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心社侧重对内活动，促成社员精神上的一致，主张以道德救世，并身体力行。

1913年，师复等创办了《晦鸣录》杂志，《晦鸣录》是“民之声”，以“令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为宗旨。《晦鸣录》出版两期后被广东都督龙济光查禁，于是师复亡命澳门，《晦鸣录》改名《民声》继续出版。由于葡萄牙当局接受了袁世凯和广东省省长的要求，《民声》出版两期后，再度被禁。

1914年，师复被迫赴沪。《民声》迁上海继续印行。同年7月，师

复在上海发起成立旨在“传播主义，联络同志”的机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为实行社会革命运动作准备。该社设在法租界，以“世界语传习所”为掩护。成立时草拟一宣言，说明无政府主义的意义及无政府党联合的必要，又刊布《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与当时社会主义者江亢虎论战，使无政府主义的种子广布于国内。自《新世纪》发行以后，中国虽然也有怀抱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但是没有国际间的联络。师复编印《民声》以后，在《民声》中特设世界语部，以为言论交通的机关，又和世界各团体对话通讯，交换杂志，讨论问题。1914年8月，师复致书万国无政府党大会，报告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传播主义的过去及其进行状况，并向大会提议：（1）组织万国机关；（2）组织东亚的传播；（3）与工团联络；（4）万国总罢工；（5）采用世界语。于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始和世界发生关系。1914年8月，上海发生漆业工人大罢工，师复撰《上海漆业罢工风潮感言》，开始把领导工团（工会）的问题提上日程，为后来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工人运动”提供理论依据。

1912—1914年间，师复主持编印了《新世纪丛书》、《无政府主义粹言》和《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刊》等，发行量达数万册。这些书刊的主要内容是传播无政府主义，特别是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和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无政府共产主义，鼓吹绝对平均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提倡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强权，反对一切政治和法律，对此后的无政府主义者产生过很大影响。五四时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活跃分子，大多是师复的同伴或受其思想影响的人。

1915年3月27日，师复因肺病逝于上海，葬于西湖烟霞洞旁。

二、清末之新思想

在辛亥革命以前，师复主要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反映他的思想并得以保留下来的作品，大抵写于被囚禁香山监狱的两年。他曾著《粤语解》一书，就古今不同的粤语，考究其本源、流变。又著有《狱中笔记》，更根据狱中的经历，草成《改良监狱议》。还以各种笔名在《香山旬报》发表一些作品，基本内容为要求思想解放，宣传平等观念，批驳康有为等保皇派的“谬论”和儒学，鼓吹反对清廷和立宪派。

师复提倡平等观念，尤其是男女平等。1906年，师复在故乡石岐

镇创办“隽德女学”，提倡女子教育，此时已经具有使女性平等受教育的想法。1908—1910年在《香山旬报》等刊物上发表的文字体现了更强的男女平等观。他以篆文“妻”的字形演变为例指出，改其字形作妻，隐欲令为女子者挺出而恢复人权，以期与男子齐等的意思，由此认为，我国先民在创造文字之时，已深知贵男贱女之俗之不合公理，而隐寓其意于六书。他还指出佛初不度女人，成道后，因姨母摩诃波暗波提恳求来出家，佛乃度之；男女并度，而比丘尼、沙弥尼，式叉摩那、优婆夷与比丘、沙弥、优婆塞，同列于七众，由此可知佛教中存在男女平等观。

除了提倡男女平等，师复还反对歧视蛋民、堕民和蓄“世奴”等等，认为应将之作为野蛮现象消除。他指出，一些地区倡导释放世仆和倡建蛋民学堂标志着民族平等观念之日渐发达。

师复批判了孔教。他指出，当时政俗之败坏，已不可方物，政治则重文法而鲜核实，学术则尚文学而轻实科，风俗则崇奢侈而厌简朴，这源导于姬周，其教则成于孔子。儒教影响于人们道德，其害尤烈。儒家之病本在务虚名、营禄位。师复提出，将六经与儒家分离而破孔教。他把《易》、《论语》、《孟子》等归于哲学部；《书》、《春秋》、《仪礼》等归于历史部；《周官》归于政治部；《诗》、《乐》、《尔雅》等归于文学部的文辞类、音乐类和训诂类。他认为：“经之名既废，孔教之藩篱乃破。学者得各发舒其思想之自由，而不为一家之说所束缚。学术以是而光大，国粹以是而保全。”

值得注意的是，师复之所以反孔，原因之一还在于抨击立宪党人并反对康有为关于孔教的“谬论”。师复认为，立宪党人浮竞无耻，实儒术有以养成。由于专制之政府倡之于上，无识之学者和之于下，康有为之“谬论”，一旦死灰复燃，大有燎原之势，因此，他才多次发文批判孔教。

师复以汉族与苗族为中心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分析，讨论了民族与国土的关系。他还对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如新少年、新志士、新社会之人物、新名词、留学生考试等进行了描述和反思，如认为，昔日之博学弘词科，今日之考试留学生，其浮滥无实等。

师复这一时期思想已经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新思潮的某些特征，比如对平等观念、女性解放的倡导，以输入的西方新学说来观察中国，将中国的经史子集纳入西方学术分科等。师复的这些思想不仅反映了清末

社会文化的变动，而且有助于理解近代思潮演变的历史脉络。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自由平等，反对孔教等思潮的涌现可以溯源到清末师复等人的思想变动，正是清末新思潮的集聚、发酵才汇聚成新文化运动的大潮。

三、心社社约之讨论

1912年，师复等创立心社，制定了十二条社约。师复发表了一些讨论社约的文章，包括不吸烟、不饮酒与卫生、素食主义、不用仆役与平等主义、废婚姻主义、废家族主义等。

师复表示，之所以成立心社，是因为风俗败坏、民德堕落而由现代社会的伪道德、恶制度造成，因此期望破坏一切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公道的真理的新道德、良制度代之。师复对十二条社约阐述如下：

食肉、饮酒、吸烟是人生最粗暴、最污浊之嗜欲，为背乎科学真理之劣嗜好、恶习惯。他常常从科学的角度讨论食肉、饮酒、吸烟之害。他从医学上论述素食主义，指出，经医家考验，肉食品含毒质至多，脑筋肠胃血络诸病，往往因为肉食所致，其中又有传染病的种子，为患尤烈。

用仆役及乘轿乘人力车绝对违背自由平等之公理。不坐轿、不坐人力车，则轿夫、人力车夫将别谋正当生业，恢复其自由之人格。

人无男女，皆有独立之人格。婚姻制度无非强者欺压弱者之具而已。必废绝婚姻制度，实行自由恋爱。要废婚姻，必须破除对伪道德的迷信，而且要让女子经济独立。提倡废婚主义，是为了唤起一般女子的自觉心，急谋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以恢复其本来之人格。

有族姓则有长幼尊卑之名分，长者尊于天，幼者卑于地，蔑视公道，丧失人格。有族姓则有界限，由族界而县界、省界，由县界、省界而国界、种界，小则为乡族之争斗，大则为国际之于戈，戕贼人道，扰乱和平。

政府、官吏、议员、政党都是强权，强权即平民之敌。海陆军是扰乱和平者。

宗教是强权。有强权则不平等，有强权则不自由；人欲平等自由，即当反对宗教。

基于此，师复提倡心社十二条社约：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

乘轿及人力车；不用仆役；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对于十二条社约，师复躬行实践，不肯丝毫放松。后来当生病很重的时候，医生以其身体虚弱，屡次劝师复食肉以补充营养，但他至死也不肯违背。

四、传播无政府主义

1904年，师复留学日本期间，已经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的著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香山监狱被囚期间，他阅读了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关注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情况，并与无政府主义人士取得联系，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研讨。经种种刺激及研究，师复思想为之一变。出狱后组织暗杀团，虽未尝标揭无政府之主张，但以“反抗强权”为宗旨，已不再是过去那种从事政治斗争的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爆发，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师复认为当时最急要的并不是从事暗杀等单纯的破坏，而是传播无政府主义，散布社会革命的种子。1912年，他解散了暗杀团，5月，在广州西关存善东街八号发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舍。从此，师复由信仰无政府主义变为对中国无政府主义最早的积极宣传者和组织者。师复扛起了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大旗，将无政府主义传播的阵地由国外转移到国内，成为清末和新文化运动之间无政府主义传播的领军人物。

19世纪晚期，国内一些书报开始零星报道一些无政府主义和俄国虚无党的情况。20世纪初，马叙伦等人把无政府主义当做一种新思潮进行了介绍。留学东西各国的中国人吸收各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思想而转贩于国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世纪》、《天义报》和《衡报》。1907年，在巴黎的李石曾等出版了第一份华文无政府主义报刊《新世纪》（1910年5月停刊）。同时留学日本的张继、刘师培等于东京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与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关系密切。该会不但研究社会主义，同时研究无政府主义。刘师培等于1907年6月创刊了《天义报》（1908年4月停刊），后又创办了《衡报》（1908年10月停刊）鼓吹无政府主义。不久，刘师培返国而为端方之幕宾，张继也离开东京而到巴黎，于是无政府主义在东京的宣传归于沉寂，而巴黎的《新世纪》遂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唯一机关。李石曾等将克鲁泡特金等

无政府主义者的著述时时译为华文，又刊发小册子多种。辛亥革命后江亢虎在上海发起“中国社会党”，他部分赞同无政府主义。

清末无政府主义传播中心主要在国外，1912年晦鸣学舍成立后，刊布了众多印刷品，介绍无政府主义学说于内地，一时风气颇为之披靡，国内成为无政府主义传播的中心。1913年夏间，袁世凯解散了“中国社会党”。当时，全国之中，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仅存晦鸣学舍。张继、吴稚晖等皆中国提倡无政府主义之先进，辛亥革命之后，张继作议员，吴稚晖亦时周旋于国民党间。张继、吴稚晖等与无政府主义党日渐疏离，他们留下的空间中，师复扛起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大旗左冲右突，其作用更加凸显，形成师复主义。张继、吴稚晖等一度热衷于宣扬无政府主义，却未能够身体力行。师复则不同于这些人，他在转向无政府主义后则是毕生身体力行，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坚持自己的信仰，甚至因贫放弃治病而为无政府主义献出年轻的生命。悲壮的人生、强大的人格魅力无疑有力地促成了师复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范本”、“偶像”之一。

在辛亥革命后的两三年间，师复等人所办的刊物——主要是《民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和主张。1914年，师复等在上海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该社一方面传播无政府主义，一方面联络世界无政府者，还鼓励内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各就其所在地设立传播机关，为将来组织联合会及实行革命运动做预备。

师复深受欧洲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介绍、阐释欧洲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其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如下：

无政府主义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反对强权政府。社会主义相对于经济而言，无政府主义则相对于政治而言。无政府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即主张以生产之机关（即土地、器械等）及其产物属于社会。社会主义分为两大派：即“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以生产机关及其产物全属之公共，人人各尽其能，各取其所需；集产主义主张以日用之物（如衣、食、房屋之类）属之私有，生产之物（如机械、土地之类）属之公有（或国家）。二派之外，还有独产主义等。

师复等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其思想观点主要是巴枯宁与克鲁泡特